

中国与诸大国关系

第

十

一

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与诸大国关系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与诸大国关系/陈玉刚主编.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 11 辑)

ISBN 978 - 7 - 208 - 10690 - 1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②中外
关系—研究 IV. ①D81②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571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十一辑 ·

中国与诸大国关系

陈玉刚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226,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690 - 1/D · 2072

定价 30.00 元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1/2012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一辑 / 2012年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1/2012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主 编：陈玉刚

副主编：潘忠岐 苏长和 唐世平 张建新

本辑执行主编：陈玉刚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或字母排序）

Callahan, William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樊勇明 复旦大学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黄仁伟 上海社科院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

Lampton, David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秦亚青 外交学院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Telò, Mario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LB)

王正毅 北京大学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郑在浩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Zweig, David 香港科技大学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沙天 包霞琴 薄 燕 陈玉聃 陈志敏 何佩群 黄 河 蒋昌健

秦 倩 沈 逸 吴澄秋 肖佳灵 徐以骅 俞沂暄 袁建华 张 骥

目 录

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和中国的体系战略	/陈玉刚 1
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	
——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	/袁 鹏 15
体系、政府与社会的博弈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美关系	/达 巍 26
试析冷战后中美安全互动的主体性结构	/潘忠岐 42
对后危机时代中美经贸关系的思考	/黄 河 任 翔 华琼飞 77
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	/陈志敏 94
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如何把握中欧经贸关系	/张晓通 111
21 世纪头十年的中俄关系	/姜 毅 123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与前景	/刘清才 张海霞 139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新变化与中日关系	/包霞琴 吴文龙 167
全球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杨晓萍 张贵洪 186
中国与巴西关系：从南南合作典范到大国关系	/周志伟 206
从南非对外政策趋势透视中南战略伙伴关系	/黎文涛 224

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和中国的体系战略*

陈玉刚**

【内容提要】 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关乎着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历史并没有给大国关系的管理提供多少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严格说来,成熟的大国关系管理只在 19 世纪的欧洲多极均势和 20 世纪的美苏二极冷战存在过,冷战结束,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开辟了大国关系的新阶段。后危机时代大国关系的新特征,也是新挑战就是大国数目的大幅增加,大国身份的日趋多元。中国的崛起已成为触动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体系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新的大国关系中,中国仍应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战略,同时考虑身份战略、伙伴战略等新的战略内涵。

【Abstract】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defines the main character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relates to the overall system stability. History hasn't given much useful experience to manage great powers relations. In a strict way, mature management of great powers relations only existed as the multi-polar balance in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i-polar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 new period of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was revealed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articularly after the break out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great power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dentities of great powers are the new characters and new challenges as well for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in post-crisis era. China's rise has been a factor of adjustment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stepped into a big reform period. China should continue its peaceful development strategy. Meanwhile it should also consider such new contents as identity strategy and partnership strategy.

*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 11JZD047,作者系项目首席专家。本文也是教育部 2009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代号 EYH3056067。

** 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大国崛起来说具有转折性意义,因为衡量中国在上世界上经济地位的两个重要指标是紧接其后完成突破的,先是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继而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还从一个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大国,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78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41%。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已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已跃居世界第五位,跻身世界资本输出大国的前列。^①当然,中国崛起的命题早在21世纪初就已开始讨论,但如果说之前这是作为一个命题来论证,或者说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的话,那么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许多人都开始确信中国的大国崛起已成事实,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都深陷危机,至今还无法自拔的背景下。

无论愿不愿意,中国的崛起已成为触动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是重要的一方,在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发言权改革中,中国是最主要的考虑。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对外战略调整中,对华关系也是其最核心的关切。在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上,中国的参与也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总之,国际体系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既是促成其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变革调整的重要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大国关系的内涵和发展变化规律,如何认识当前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如何确立中国的国际体系战略,这已成为崛起后的中国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本文拟对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为接下来十年的国际关系发展基本走势及中国的国际战略思考提供一定启发。

大国关系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

大国关系是指一个国际体系内主要大国(至少两个)之间的关系状

^① “我国跻身世界资本输出大国”,《人民日报》2011年8月31日第11版。

态,以及这种关系运行的内在机理,所依据的主要规则和大家都遵循的基本规范。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关乎着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大国关系处理的失败意味着体系的失败,体系性的动荡甚至战争。

大国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主要的规定因素。不过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大国始终是重要的,可在国际体系处于松散的区域性体系时,大国关系并不重要,因为大国之间有足够广阔的缓冲地带,大国之间并不发生经常性的密切联系,每个大国处于各自区域性体系的中心,它们是在作为区域体系核心的意义上才重要的。大国关系在古代历史上是不重要的。

因此,历史并没有给大国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提供太多经验。^①大国关系只有当欧洲进入民族国家体系后,才在欧洲区域范围内开始显示其重要意义,而且随着欧洲体系的对外扩张而开始变得具有全球意义。可是,在当时,大国关系与今天比起来仍然是相对简单的,因为欧洲大国之间本来就联系紧密,有着相互难以分割的历史联系,^②即使国家处于激烈竞争时,社会和经济的联系仍非常密切。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相互间容易理解沟通,容易确立共同的规则规范,用布赞的话来说,这里不存在体系中的身份差异。^③地处东方的俄国是稍后才加入欧洲的大国体系的,但也基本上是在俄国完成了“西化”,接受欧洲的文化 and 价值后才真正成为欧洲大国的一员。因此,欧洲为主的大国关系基本上是比较简单的,均势可以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机理和大国关系管理的重要原则而发挥作用,并且得到这个体系的接受和认可。为此,第一,维持若干数目的大国,且保持其力量的大致相当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体系的稳定并不以消除战争为目标,和平与稳定二者在这个体系中难以并存,为了维持体系的稳定,必要的战争是允许的;第三,小国的利益在这个体系中随时可以被牺牲,只要能维持大国的平衡;第四,对于一些大国来说,区域内的内向发展并不是唯一的野心出路,因为这个时期世界上还存在大量可供殖民扩张

① 参见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可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沈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③ 参见巴里·布赞:《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的地区,大国野心也可向外用力,而这并不会在根本意义上改变大国关系。只是到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大国间的殖民地争夺才被赋予了大国竞争的意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使得国际体系在地理意义上从欧洲体系开始变为全球体系,不过这种改变并不具有全部的意义,因为和俄罗斯相似,日本的崛起是通过“脱亚入欧”完成的,在身份上至少部分被当时西方为主的体系大国所接受。美国本来就是欧洲文化的一种延伸,可以看成是欧洲体系放大版的地理扩展部分。但是,这里也并非完全没有变化,美国的崛起至少给欧洲的大国关系管理带来了二大挑战:一是国际联盟在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极力推动下建立,主权国家平等的观念开始确立,它意味着要消灭一个被国际联盟接受的主权国家开始变得难以接受了(当然,“二战”严重地践踏了这一原则,不过“二战”后这一原则得到了更大的伸张);二是同样由美国推动的民族自决思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传统大国关系处理中随意决定弱小民族命运的做法。

不过,总体上,20 世纪前半期的大国关系处理是比较混乱的。欧洲大国仍然关注内部的权力争夺,按传统方法处理大国关系,即使局势已与 19 世纪大不相同。美国的崛起带来了外交上的一些新理念,不过欧洲并不打算在规则上接受这个新来的大国,“凡尔赛和会”按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方法组织进行。美国和日本这二个新崛起大国在欧洲外的地区,特别是远东急剧扩张势力范围。全球性的大国关系曾试图管理过,如国际联盟的运作,军备尤其是海军发展的限制谈判等,不过总体上是失败的。总的来说,这时期的大国关系处理新的方法在探索尝试,老的办法一如既往地惯性运作。

“二战”首次重大地改变了大国关系,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国数目的变化上,大国关系本身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战争使得欧洲传统大国从体系大国沦落为二流国家,大国数目减少为二个,美国和苏联成为国际体系的二个超级大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在社会制度上也变得和其他大国不同,这使得体系的身份差异问题变得突出了,大国竞争不仅仅具有权力争夺的意义,还关涉到信仰、价值和制度模式等社会个体得以在国家内安身立命的内容。大国竞争被赋予了全面的意义,这样的竞争不只是与掌权者相关,还与每一个民众的命运相连。因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以及远程轰炸机、导弹等远程投射技术的发展,尽管大国关系的气氛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紧张,这种关系被赋予了“冷战”一词来描述,但大国之间的战争也变得难以想象了,战争作为大国关系处理的手段基本上被剔除出了工具箱,尽管大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并未消除。国际联盟在联合国身上得到了复活,主权国家的概念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而且随着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这种强化真正获得了全球性的意义。

因此,冷战开创了大国关系内涵及其管理的第二个全新阶段。体系大国的数目减少到了二个,虽然均势可以从多极变为二极,但多极均势是灵活的、变动的、可调整的,二极均势是僵化的,甚至是恐怖的,大国力量的强弱无法通过外部办法来调节,除非其内部自身发生变化。大国竞争被全面意识形态化,身份的管理成为大国关系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竞争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增加或减少权力,而且上升到了证明自己制度和模式优越性的高度。大国管理在三层意义上同时存在:一是二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管理;二是每一个超级大国对各自所控制阵营的国家集团的管理;三是对二大阵营外地区和国家的争夺。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还具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属性,因此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家也被赋予了大国的政治地位,具体体现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台湾蒋介石当局霸占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时,这一结构和冷战的二极结构高度一致,因此这一属性的体系性意义并没有得到重要体现。不过,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后,二者之间的叠合结构被打破了,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进程开始启动,联合国本身也因此获得了新生,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因此,战后大国关系的内涵和管理的变化,最早算起应该在这一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冷战结束正式标志着二极结构的大国关系瓦解,大国关系进入了急剧的调整期。冷战结束给国际体系环境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世界从分裂又回到了统一状态,这一进程又因另一组词的出现而得到了强化,那就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全球化是对二极结构的否定,全球治理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尝试性规定(当然,大国关系管理并非全球治理的全部意义,甚至不是其主要意义,一定意义上全球治理试图超越传统的大国关系规定和理解)。不过,这一进程和历史上大国关系的转型一样充满转折,面临

着新老势力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主要体现为单极化冲动和多极化潮流之间的竞争,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斗争。

冷战结束给后面大国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条件性因素,包括:第一,冷战式的意识形态竞争消解了,不过身份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论点提出了新的身份问题,如文明冲突论;^①第二,非国家力量的兴起,国际制度因全球治理的需要而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非常活跃,恐怖主义这样一些破坏性的非政府力量也改写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不过,非政府力量究竟会以什么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变大国关系,这一点还无法得到全面的理解;第三,全球性问题因全球化的推进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包括环境、气候、能源、资源、粮食、传染性疾病等。这些问题的压倒性挑战是否会,或在何种程度上改变大国对权力的追逐和竞争,这一点也有待于继续观察;第四,地区性结构的崩塌和重建与体系性的总体稳定共为转型期的二大特征,地区问题背后既有传统大国关系的影子,也有地区力量试图借地区结构重建以抗衡传统大国政治的努力。

如果时间快进二十年,回头看也许会发现,对于大国关系的变化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比冷战结束更具有标志性的转折意义。可以说,1989年到2008年的二十年是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变动过渡时期,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真正开始了大国关系的改写进程。

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

辩证地说,一种体系的稳定结构在时间跨度上要比过渡转型短得多,国际体系的结构一旦成熟,其变化也同时开始酝酿。欧洲体系的多极均势在19世纪只典型地存在了几十年,严格的二极结构也就只存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的大部分历史都处于变动不居和各种可能的探索中。因此,金融危机的转折性意义也不在于立即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大

^①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国关系时代,更大意义上在于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

美国的衰落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讨论,不过 90 年代新经济的兴起和单极时刻的幻象一度搁置了这个问题。21 世纪的前八年,美国的全球反恐遮掩了其对体系问题的关注,或者说美国试图借全球反恐重塑国际体系,但事隔八年后突然发现国际体系并没有跟随它的意愿发展,于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一些美国人发觉自己失去了 21 世纪近十年的战略机会。在经历了全球反恐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衰落问题再次成为了一个体系性的问题。

美国究竟是否衰落了?或者美国是否还会凭其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像以前那样在危机后再次浴火重生?这样的争论还在继续中。不过,人们似乎已经等不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尘埃落定,各种 G-X 的提法纷纷出笼,有说中美 G2 概念的,也有主张 G3 的(中、美、欧三家共管),还有依然坚持五大力量说法的(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可以说是传统的 G5)。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有对 G20 寄予厚望的,希望二十国集团担当起管理世界的主要责任。其他关于部分国际体系 G-X 的提法还有 G7 或 G8(七国或八国集团),以及在此基础上的 G7+5(存在于 G20 峰会形成之前),金砖四国(G4)或现在的金砖国家(另一个 G5 概念),基础四国(另一个 G4 概念),发展中五国(又一个 G5 概念)等。我们可以把这么多 G-X 概念的出笼称之为国际关系的 G 化现象。这种现象越严重,从一个侧面说明国际关系越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演化的各种可能性越多。对于厌倦了演进中的国际体系到底会有几个大国的争论的人来说,干脆宣布世界已进入无极时代。^①鉴于金融危机对西方传统大国的创击,以及新兴国家的纷纷崛起,国际关系的 G 化现象可以预料只会更多,而不是相反,在短时间内能够淘汰、沉淀和定型。

美国的衰落不仅仅是它自身的问题,它还给转型中的国际关系带来了一个体系悖论。美国衰落并没有使国际体系出现权力的顺利转移,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反而促使另一些国家,包括崛起国家的邻国和其他崛起国的不安和警惕,从而促使其中的一些国家更倒向美国,

^① 参见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5 期;陈玉刚:《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机遇》,《国际观察》,2010 年第 1 期。

使美国的联盟体系在许多地区都得到了重新界定并强化。这就导致了国际体系变革中的一个悖论,美国在强盛和单边主义冲动最强烈时期面临的国际压力最大,而金融危机重创下美国的衰落却反而增强了其体系地位和在一些地区的安全影响。国际体系的这个悖论不得不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国际体系变革中美国的角色和地位问题,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体系变革的不安,并造成了它们的逆势而动。

尽管本集我们分头讨论中国和各传统大国以及新兴大国的关系,但大国关系的变迁具有它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导致了升降中的大国不同的命运和结果。从历史上看,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和整个国际体系迎头相撞,其结果不仅仅是自己的崛起失败,还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相比之下,同样是后崛起的美国,却抓住了体系变革的机遇,成功地承接了体系霸权。这意味大国关系的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大国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整个大国关系的时代性内涵和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一个大国和整个大国群体的关系,研究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大国关系的整体性粗略地看,可以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大国间的联盟和制衡关系。历史上,大国间的联盟和反联盟一直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尽管传统意义的军事同盟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就处于新老转型中的当下来说,我们仍无法忽视联盟会在大国关系变动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第二,国际体系的正义性。尽管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有其自身的实力因素,但作为正义一方的领导力量,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它们大国地位的获得并被承认仍有重要的关系。虽然把国家或国际力量区分为正义与邪恶在和平时期是危险的,不过一个体系在不同时期有它主要的导向存在,或者说主要的国际规范,也可以说较为具体一点的体系正义存在,这么说并不会有多大错误。就当前来说,缩小贫富或南北差距,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可持续发展,核不扩散,维护国际和平,尊重主权和各国的自主发展等,这些都可以说是体系的正义因素。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的正义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应和国际体系的正义性实现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大国关系一定意义上也是各大国在国际体系正义中的地位关系,国际体系正义的分配和占有关系;第三,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虽然大国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上位,但大国毕竟存在于国际社会中,每个大国都会有,也

需要它的国际社会依存。因此,大国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关系;第四,大国关系之所以成为大国关系,如本文一开始所讲的,大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这种互动属性构成了大国关系整体性的一个主要特征。联盟和制衡关系并不能反映大国互动内容的全部,大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的相互依存使得许多大国关系处于联盟和制衡之间的大量模糊地带。这也许就是当前如乐玉成部长助理所讲的新型大国关系;^①第五,大国关系与体系公共产品的维护与供给。每一个体系或多或少都需要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如公海的安全与自由航行。供给公共产品首先是大国的责任,大国之所以为大国,除了实力超群外,它为国际体系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比一般国家要多些。当然,供给公共产品并非纯粹贡献,它同时也会给供给者带来一定收益,尤其是当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难以区分的时候,或者说以私有产品来充当公共产品的时候,如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就属于这一种角色。因此,公共产品关系也反映了一定的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的整体性在金融危机后应该处在进一步的加强中,二十国峰会一再强调要协调应对危机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审视大国关系时,不仅仅看到大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整体的大国关系对大国间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如一些专家所言,如果仅就中美两国而言,双方关系确实进入了一个崛起国和一个霸权捍卫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暴露时期,再悲观一点讲,大国悲剧的历史规律似乎要在中美之间应验,^②但如果考虑到大国关系整体性对局部大国关系的影响,或者运用整体性大国关系来调节局部大国关系,那么中美关系也不是可以避免大国悲剧的重演。

金融危机给大国关系带来的变化还在于,这一轮大国关系的变化并非由中国一家崛起促成,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这一次变化的主要特征。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大国也不只是美国在相对衰落,西方国家普遍遭遇危机,美国遭受金融危机打击,欧洲则面临债务危机折磨,而且许

① 参见乐玉成:《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②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多专家都预测这次危机的影响将是长期的,说明西方大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在 2011 年末,英国著名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最新数据显示,英国世界第 6 大经济体的地位已被巴西取代,并预测英国的经济地位在 2020 年将会进一步跌至第 8 位,被俄罗斯和印度超越,德国跌至第 7 位,排名巴西之后,目前排名第 5 的法国更会跌至第 9 位。^①这说明,这一轮大国关系的变化是深刻的,也将进入一个缓慢调整的过程。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至少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新崛起国家将会如何运用它们的力量,它们的力量运用方式是否会和传统西方大国迎头相撞,世界是否分为新大国和老大国两大群体,世界权力和秩序将如何在新老大国之间进行再分配;二是大国数量将因此而大幅增加,大国身份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元,身份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身份管理问题将变得更复杂。

回到本文一开始所讲的,也是基辛格十多年前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当大国数目大幅增加,大国身份日益多元后,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大国关系的处理经验。在没有先例可循中探索,这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大国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

中国的大国和体系战略

如果说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大国崛起还是个命题的话,那么普遍认为,作为标志性的突破,中国的大国崛起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完成了,尤其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如果说全面崛起还有些为难的话,至少可以说经济崛起已经实现。崛起后的中国应执行什么样的大国和体系战略,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1. 和平发展的基本战略

和以往大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国崛起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至

^① 《巴西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欧洲或倒退》,《新华网》2011 年 12 月 27 日。

少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三十年,中国成功地执行了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战略,这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基本经验和道路。那么,接下来一个战略性问题是,中国在下一个三十年中,或更长的时间内是否还能保证继续和平崛起。布赞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和平崛起的战略或政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成功的,但这并不代表今后的三十年还会继续成功,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转折点挑战比以前大。^①

布赞认为,和平崛起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崛起中的国家把自己融入到国际社会的规则和结构中去;二是其他大国为了适应新的权力配置和地位而接受规则和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能靠中国独自完成,需要中国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创造条件。布赞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考验着中国在接下来三十年中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国成为大国后,任何对外的回应都会产生体系性影响;二是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有利环境接下来可能难以继续存在;三是环境危机,这影响着整个世界包括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四是美国在国际社会领导能力的下降,这考验着国际社会是否会走向弱领导或分裂性的领导。具体地说,中国未来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以及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美关系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含义,一是全球层面,中国对美国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中国需要美国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想和美国陷入一种冲突关系中,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和单极结构;另一方面,中国越崛起,就越少依赖美国,越多反对它的领导。二是地区层面,实际上美国经常动员和中国关系不好的国家来敲打中国,而中国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如印度又把它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有美国的牵制基础上。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布赞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布赞认为中国走的是改良主义道路。^②

确实,如布赞所言,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和体系战略最关键的是要继续成功地执行和平发展战略。和平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自身必须保持持续的稳定和发展,历史上的大国衰落既有外部环境因素,更有自身内部

①②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1, Spring 2010.